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 古今通论
- 古代通论
- 世界史论
- 当代三农
- 现实问题
-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 先秦通论
- 原始经济
- 文明起源
- 夏商西周
-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 汉唐通论
- 战国秦汉
- 秦国秦代
- 西汉东汉
- 魏晋南北朝
-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 宋元通论
- 唐宋通论
- 北宋南宋
- 辽金西夏
-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 明清通论
- 明代通论
- 明中后期
- 清代通论
-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 近代通论
- 清代晚期
- 民国通论
- 民国初年
- 国民政府
-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 近世通论
- 现代通论
- 前十七年
- 文革时期
-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 学科发展
- 专题述评
- 年度述评
- 学人学术
-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 史观史法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理论方法 / 史观史法 / 经济史学理论方法 / 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上）

## 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上）

2004-10-24 吴承明 经济史论坛旧版 点击: 2339

### 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上）

#### 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上）

作者: [吴承明](#)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2-17 0:31:22发布) 阅读803次

编者按:

这是吴承明先生论述经济史学研究方法最为详尽的一篇文章，因文章较长，现分三次刊登。文中有些图因条件所限，暂未能显示，请读者谅解。

1986年底，我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上作了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的发言。当时主要是谈个人看法，对各学派治史方法的介绍甚简，“或我所不知而举疑”。

[1]④近年来，经济史研究方法又有新的发展，我在为两本经济史著作所写的序中亦曾提及。本篇是增补前发言而作，“我所不知”者固多，仍举疑或阙。文中例举了一些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论著，是专就其所用方法示例，不涉及论著本身的得失。至于对各学派研究方法的评论，皆属拙见，谬误之处，祈读者指正。

#### 一 方法论的涵义

方法论一般说是思维工具，具有指导性和实用性。惟目前治史中所称方法，实有不同涵义或不同层次的内容，大别有三。

##### 1. 世界观意义上的方法论

这是指历史观或历史哲学，研究人类发展全过程的本原和发展规律，故亦称元史学

(meta—history)，如黑格尔的以自由精神为本原的历史发展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汤因比的多元文明兴衰论等。历史哲学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抽象，包括世界观和历史观，但在我们研究具体历史时，它只是一种指导思维的方法，切忌教条式使用。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①列宁说：“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是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3]②黑格尔的自由精神理论今天已基本上被否定，但他的辩证法作为方法论仍有启发性；汤因比的文明史观今天已少人注意，但其多元比较研究方法仍很有价值。

治史必受某种世界观和历史观指导，无人或免，不过常是无意地或不明确而已。

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应是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世界观层次的指导方法，也是检验其他层次的方法的工具。下文将专论。

##### 2. 求证和推理意义上的方法论

有人说，方法论是受世界观支配的，培根是唯物论者，因而发展了归纳法；笛卡儿是二元论者，因而提出逻辑演绎法；黑格尔是唯心论者，故用思辨哲学的方法。我以为非是。培根的归纳法（《新工具》，1620年）、笛卡儿的演绎法（《方法论》，1637年）原是在研究自然科学和数学中建立的，它们是分别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两种不同的认识论而来，以后科学的发展是这两种认识论交互为用的。这里抛开认识论，单从方法论来说，归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归纳和演绎的目的都在求证和推理，作为方法论，它们具有独立性。任何认识、论点都需求证和推理，都可利用它们。历史研究重在求证，但亦不可偏废推理；因人不能尽知天下事，须推理求之。恩格斯说：“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4]③这种方法，又常带有操作规程（如三段论），有通用性。至于黑格尔的辩证法，除操作规程（指正反合）外，并有合理内核，为马克思所取用。

求证、推理意义上的方法论中，最具影响的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者（如杜威）一般不承认人的认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故在世界观上不是唯物论者。但他们所用方法实际是一种经验科学：一切始于观察，十分尊重经验，经归纳和验证，得出结论。这对历史研究是可用的。至于进一步将结论抽象为概念，将命题归纳为更基本的命题，则已是哲学家的事，历史研究毋需走那么远。

对立于实证主义，卡尔·波普尔从科学理论的发展必须否定旧的、肯定新的出发，提出证伪主义。[5]④波普尔认为人的知识先于观察和经验，在 worldview 上可说是先验论者。但他强调提出问题，他的提问、假设、证伪、求真的“猜测与反驳”（四段论），作为方法论，仍然可以为我们所用。就历史研究来说，提出问题非常重要，而一般不宜假设。但在追索具体问题，提出不同答案，证伪以存真，这在我国的考据学中早已用过了。

我国的史料学和考据学方法兼有求证和推理的功能，下文将专述。

### 3. 经济学学派的方法

研究经济史须利用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更专门学科的方法。这些学科大都学派林立，而所谓学派，大皆由理论和方法组成；这类方法，英语常称 approach，原意“接近”，即如何进入本题，或译“思路”。仅以经济学为例，以概其余。

古典政治经济学初建时，亚当·斯密采取抽象分析和现象描述两种方法。以后经济学的方法论即沿这两个途径发展。[6]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建了科学的抽象方法，用范畴进行分析，但并不废描述。西方经济学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日益众多的流派，方法上也日新月异，但总是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描述和分析经济现象。

经济史应力求具体，不能写成抽象，抽象的理论只作思想指导。经济学各学派方法纷坛，但总的说不外二途，即模式法和因素分析法。模式有不同类型，功能各异。[7]②但总是根据一个总体概念或结构来描述或推导各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和运动。因素法则是从材料入手，考察各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和运动，再界定总体。模式法已成当前风尚，在我国亦广泛用于对现实经济的分析、预测和计划。但在经济史研究中，除某些具体问题和计量分析外，我以为要慎重对待。历史上，各时代经济的发展总会形成某种模式，但它是研究的结果，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例如半殖民地半封建，原是对我国近代社会的一种概括，若以之作为研究的模式，把近代各种因素都纳入这两个“半”中，“不归杨，则归墨”，那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了。马克思介绍他研究经济学的方法说：“研究必须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8]③这方法也完全适用于经济史研究，这就是因素分析法。

对于各学派的方法，我选择若干可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归为五项；即经济计量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方法、区域经济史方法、社会学方法、系统论方法，下文专述。[9]④

### 4. 对方法论的看法

我国早有“史无定法”之说。我赞成此说。这当然不是说可任意判断，而是说治史可因对象、条件之不同，采用不同方法。

1984年，我在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中国经济史国际讨论会上说：“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来说，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同一问题可用不同方法论证者，不妨并用；若结论相同，益增信心；若不同，可存疑。

这是把世界观意义的方法除外而言。对所有方法，都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去评价，但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该方法本身的实用性和对所研究问题、现有资料的适用性。求证和推理一类的方法，包括我国史料学和考据学方法，基本上不发生世界观问题。经济学、社会学等各学派的方法，与学派的观点有关，但学术观点不必都是世界观问题。其中有些方

法是可通用于其他学派的，有些略加改造即可移用于其他观点。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衡量，所有的方法都有其局限性；这也说明，没有一种万能的方法，而应“史无定法”吸取各家之长。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以来，我们的失误，多半是在教条主义上，对于方法论也是这样。如考据学是我国传统史学方法的瑰宝。三十年代初，它曾以“封建性”而遭批判；五十年代后期，考据又一度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标志；到八十年代初，它才得到正确评价，甚至出现一股“回到乾嘉去”的热潮。对于外国通用的一些经济学方法，如投入产出法、经济计量学方法等，在我国都有一个先是否定、然后肯定的过程，而且都是在研究社会主义现实经济上应用以后，才引起史学家的注意。在方法论上，史学家是比较保守的。

## 二 史料学和考据学方法

史料是史学的根本。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傅斯年说：“史学本是史料学”，曾遭非议，但从方法论说，治史必须从治史料始，则是道出根本。不治史料径谈历史者，非史学家。

所以说“治史料”，因为史料并非史实，经考据、整理后，庶几代表史实。史料（包括文献、文物、口碑）都是人为的，其中不免失误、失真、夸大、缩小、隐讳以至伪造。这就需要考据学，“考而后信”。又历史是连续的，而史料皆属片断，或仅见一个侧面。这就需要史料学予以整理，“类而辑之，比而察之”，[10]①以期得到比较全面的认识。清乾嘉学派的朴学，实包括史料学和考据学两者，是我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两者所用方法亦多兼通，有训诂、校勘、辨伪、类推、辑佚诸法。

乾嘉学派的大功是在认识论上摆脱了宋明以来讲心、性、义、理的理学方法（形而上学方法），而以朴实态度追求历史文献的本来面貌。他们不必是唯物主义者，但一般具有顾炎武所倡“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的训诂、校勘、类推都是以归纳法为主，每事必广集例证。胡适说：“他们所以能举例作证，正因为他们观察了一些个体的例证之后，脑中已有了一种假设的通则，然后用通则所包涵的例来证同类的例”，这等于把通则“演绎出来。故他们的方法是归纳和演绎同时并用的方法。”[11]②此说有理；原来人在思维中常是归纳与演绎交互使用的。

不过，考据学并不就是举例作证。一般说，“举例子”的方法是危险的，尽管我们在治史中常用。正如列宁所说：“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12]③惟训诂、校勘是在考据某字某事的狭小范围内收集例证，收集比较完整，故危险性不大；同时又从来源上鉴别每项例证的可信性，故比较可靠。这是由众多的个别认识达到共识，故属归纳法。演绎法是由共识的通则推出个别的认识。这里通则即大前题必须绝对正确；大前题和小前题都正确，甚至可判定史家忌讳的“孤证”是否正确。考据学中的“理断”，即用常理来推断某事例之正谬，即属此法。惟清人用作大前题的常理，多本于经，这是不可靠的。治史用演绎法，大前提必须根据史，且必为信史，始得当。

我国史学中原有提问、设答、证伪之术、前已言及。有问题才需考据，而假设是思考之始。不过清人的假设常是隐于心中，不明白写出，以见其“朴”。清人的辨伪主要用溯源法，即查找原始记录之意。训诂中的音义，校勘中的版本，亦重视溯源。至于辑佚，原是纂补亡籍，秦人以后，历代均辑纂不少亡书，属史料学。惟清人所谓辑佚常是有目的的查找某人某事散落的零星记载，称钩沉，成为考据学之一途。

乾嘉学派亦有其缺点，其考据限于文献，特重音义（所谓“读书须先识字”）；所考皆微观事物，视野狭隘，精而不博；又常为考而考，不计实效，流于繁琐。

乾嘉以后，我国史料学、考据学都有重大发展。甲骨文、汉晋简、敦煌卷子、吐鲁番文书四大发现为新的古史研究奠定基础。王国维创“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文献对证，建立了新的古史体系《梁启超著帅国历史研究法》，说“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以至否认历史发展有规律性；但他认为乾嘉学派的方法“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他引进西方求证方法，力图使考据学科学化。[13]①傅斯年倡导整理大内档案，开后来档案史料的先河。他实际也是提出治史应有“新材料、新工具（方法）、新问题、新观念”的先驱。陈寅恪将诗文、小说以至佛典、五行杂书引入历史考据；他说：“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故有之材料互相参证”；[14]②这就使考据学日益光大。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学派

详究古文献，提出“层累地造成古史”说，考证纂详，对上古史作了比较系统的整理。陈垣提出校勘四法，即本校、他校、对校、理校。胡适总结清人朴学方法，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原则。他说：治史不能墨守古训，“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所发明”。假设是“站在充分理由上的”，但即使理由“很充分”，也还是假设，必须小心求证后，才能“升上去变成一个真理”。姑不说真理，胡适的八字原则，实在是考据学的一个跃进。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三十年代曾一度对传统的史料学、考据学持批判态度；但四十年代后期起即予以高度重视。翦伯赞对史料有多篇论述，并特别强调“史部以外之群书”。郭沫若盛赞王国维等暨《古史辨》派的功绩。侯外庐主张“谨守”朴学的“一套法宝”，并“进一步订正其假说”。[15]③

新中国建立后，史料学和考据学都老树新花，空前繁茂。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大规模地、系统地整理出多种大型史料丛刊。新史料迭出，除考古学的发现数量空前外，以档案的利用最为突出。除国家档案外，进而开发地方档案、个人档案、企业档案、社团档案，档案研究成为专业。民间文书的发掘也蔚然成风。七十年代以来，碑刻和族谱的研究转盛。八十年代以来，开展有组织的古籍整理和全国性的修地方志工作，规模之大，动员之众，世所仅见。史料既丰，今人考据学的水平亦远超过前人。

史料学、考据学也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的主流方法。加藤繁的《支那经济史考证》（东洋文库1953年版）即对此作出重要贡献。欧美的汉学家也日益注意及此。

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衡量，我国的考据学从根本上说是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并有辩证思想。但作为方法论，也有其局限性。原来中外都有“事件构成历史”的传统文学，考据学就是建立在事件考察之上的。西方常称中国传统史学为“掌故法”（anecdotal method），以此。恩格斯说：“必须先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在恩格斯时代，事物的研究已经“可以过渡到系统的研究”了，人们的认识有了飞跃，表现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16]④经济史尤其是这样。一切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有它的继承性和发展阶段性。经济史从来不应当是事件史。考据学对于系统的过程研究似无能为力。但是，历史上永远会有尚未被认识的、认识不清楚的和需要再认识的事物，考据学也永远会发挥其作用。

### 三 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包括一系列的理论、原则和规律。但在研究历史时，我们是把它作为方法，即前引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都是方法。

恩格斯又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唯一的唯物主义的观点”。[17]⑤

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规律是经过科学的抽象，并经过实践证明了的。在应用于别的学科中，可以用来作逻辑论证：例如在评论某文艺作品时，可以说它符合或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但在研究历史本身时却不能这样。如五种生产方式，可称为社会发展规律。但在具体研究某民族或地区的历史时，无奴隶社会者有之，无封建社会者有之，无资本主义社会者更有之，超越“卡夫丁峡谷”者亦有之。这些“无”正是研究的重点。

历史唯物主义大家都已熟悉。但是，我们把它作为说明历史的科学方法，是指什么方法呢？我以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也是我们研究历史中使用最多的思维方法，是历史辩证法。辩证法思想原是人们观察自然现象的总结，即自然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18]①这本来是恩格斯的意思，由斯大林明确说出。因而，钱学森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社会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对称，这是很有见地的。这就是说，我们在研究中，要用发展的观点、量变到质变的观点，而不是静止的观点来看待历史；要用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而不是孤立的观点来考察历史因素；要用对立统一的、亦此亦彼的思维，而不是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来处理问题；等等。

附带说，许多科学方法都是来源于对自然的观察。前述培根的归纳法，笛卡儿的演绎法，波普尔的证伪法，现代经济学的宏观和微观概念，行为和功能学说，以及计量学方法、系统论方法等，都是先用于自然科学，然后再用于社会科学。它们的科学性也在这里。辩证法也是这样。同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将随着自然科学的日新月异而不断

发展。例如，相对论、量子论、系统论的出现，就给历史唯物主义增加了内容；宇宙大爆炸理论和物质自组织理论必然影响我们对时间与空间、必然与偶然的看法。总之，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指导我们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它本身也是发展的。

但是，过去我们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这门课时却很少讲辩证法，而是讲国家、阶级、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们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截然分成两门课（这也作于斯大林），前者讲了辩证法，后者就不讲了。也因为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是在民主革命中开始的，继之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很自然地突出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这是1879年马克思发出的一个指挥革命的通告中说的，注意所说是一直接动力”，不是基本动力。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经济，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

这个“本意”也招致不少误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变成了“线性关系”，僵化了的公式。恩格斯晚年，在1893年给弗·梅林的信中说，马克思和他当初是着重从经济基础中“探索出”政治、法权等观念的，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当时是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也因此犯了一个错误，即忽视各种思想领域有自己独立发展的历史。因而他提出“归根到底”是经济决定的修正。次年，他在给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全面发挥了这一点：首先，经济基础不仅是经济关系，而是包括全部技术装备和地理环境。其次，“并不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政治和意识形态都相互影响；同时，经济不是自发起作用，而是经过人的决策，“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原来，在1890年他就提出历史是由人们的意志“合力”创造的理论，而人们的意志是由生活条件决定的。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各领域都有自己的历史，离经济愈远的领域，如纯思想领域，其曲线愈曲折。但如划出各曲线的中轴线，则“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跟后者平行而进”。[19]②

我想，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我所以提出来，意思是，我们研究经济史不能只就经济谈经济，要看到政治、文化、思想等对经济的作用。更不能摆出一副“我是基础，我决定你”的架势。“归根到底”是经济，但在一事一物上未必；长期曲线是各领域平行于经济，而阶段历史却未必。实际上，这也是辩证法。

#### 注释

[1]④该发言曾同时为三家期刊转载：《红旗·内部文稿》1987年第8期；《轻工业经济研究》1987年第3期；《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6辑，1987年4月。

[2]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1974年版）。

[3]②《列宁选集》第1卷第13页（1972年版）。

[4]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8页。

[5]④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6]①参见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史》，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不过，该书将方法论紧密系于学派，以及一个时代的方法论仅适用于本时代的观点，我有不同意见。

[7]②Model（模型）主要是描述、解释各因素（变量）的运动，有物理模型、数学模型，后者用于测算、求解。Paradigm（范式）有历史上的和思维、思路之意，概括观察范例，无数据。Schema（图示）为用以表现行为、功能的架构，一般无数据；但数学模型亦有图解。

[8]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9]④除以上三类外，尚有技术性的方法，如调查统计、索引卡片、计算机应用、体系设计、纲目编排等，均不置论。

[10]①崔东壁：《考信录》。

[11]②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连同下文胡适的其他见解，均见孔繁：《胡适对清代“朴学”方法的总结和评价》，《文史哲》1989年第3期。

[12]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733页。

[13]①《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六册。但前此梁启超把进化论引入史学，他在《新史学》中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者也。”公理公例可解释为规律。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册。

[14]②陈寅恪：《金明馆丛稿》。

[15]③王学典：《从偏重方法到史论并重》，《文史哲》，1991年第3期。

[16]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恩格斯这里主要指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而言，但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之一，说见下文。

[17]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

[18]① 《斯大林文选》上册第177页、人民出版版1963年版。

[19]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501—502、505—507页。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收入《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

本文2003-1-4 上传，迄今被浏览了[37]回

出处：经济史论坛旧版

责任编辑：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1 2 3 4 5 6 7 8 9 10